

苗挺 ● 著



谈说古今丛书
子通 主编

三晋枭雄

——阎锡山传

参加辛亥革命起义也曾年青有为的他，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韬光养晦，纵横捭阖，被视作狡狐；其实，天下大乱，分合争雄之际，适者生存才是高明的权术和智慧。当历史的惯性弧线趋于平直之时，他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显出了独有的光彩。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三晋枭雄

阎锡山传

苗挺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枭雄——阎锡山传 / 苗挺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120-894-3

I.三... II.苗... III.阎锡山(1883~1960)-传记 IV.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8925号

● 三晋枭雄——阎锡山传

著 者 / 苗 挺

责任编辑 / 张海元

装帧设计 / 迷谷设计室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40×960毫米 1/16开

印 张 / 18.75

字 数 / 200千

印 刷 / 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版 次 /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6000册

书 号 / ISBN-7-80120-894-3/K·186

定 价 / 28.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100029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晚年的阎锡山

引 言

在民国史上，阎锡山是一个重要人物，复杂人物，也是一个有独特性的人物。

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的太原武装起义，当选为山西大都督，从此开始了对山西长达 38 年的统治。由一个偏僻山区省份的小军阀发展成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势力所及，达到四省二市，控制了华北、京津，并一度自立为国家元首，成为左右当时中国大势的重要人物之一，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张作霖（张学良）并称，为民国以来的大军阀。

为了经营和建设山西这块根据地，阎锡山煞费苦心，和其他军阀一样，一是不断竭力扩大军队，因为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二是不断谋求扩大地盘，因为地盘就是权力和利益。而其他军阀不做或做不到的，阎锡山还做了许多，如着力于发展经济，包括发展工业，发展农业，发展交通，在不少方面都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而他独树一帜的所谓“理论”体系，更是其他军阀难以相比的。

他能够与共产党联合，在山西高举抗战旗帜，使山西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他又是向着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打响全面内战第一枪的反共急先锋；

他曾经领导了大小军阀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并且与蒋介石长期相互算计，勾心斗角；

他又是几大军阀中追随蒋介石反共到底的惟一个。他未能像冯玉祥将军那样为争取民主而追随人民革命，又未能像张学良将军那样为民族利益而不顾生死，也未能像李宗仁先生那样最终投入人民怀抱；

他精于算计，善于韬晦，为达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常常为得利而不惜背信弃义，常常在讨好各方中左右逢源，许多重要关头朝三暮四、纵横捭阖的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他重视舆论，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构建组织，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笼络人心，为长期的统治打造牢固基础；

在乱世中崛起，他留下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智慧和谋略；坚持顽固反共反人民，也留下了被后人指斥批判的劣迹；他的独特的行事策略，还留下了不少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谜团。

一 透过众说纷纭，试看尘埃落定

对于阎锡山其人的历史功过，国、共两党自然有相反的评价。而在国民党内部，也有诸多不同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阎锡山历史的复杂性。

在大陆这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诸多出版物对阎锡山的评价大体是：“反共反人民的罪大恶极的战犯”，讲到他的活动，必冠以“反动”，论及他的做为，也必称作“罪恶”。这是一种难免的历史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清除极“左”影响，文化日渐多元，评价趋于客观，又突出揭露他“两面三刀，钻营投机”的特性。不过，对他的所作所为，开始有了趋于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对他的深入研究也显现出不错的开端。

台湾方面，对他的褒扬，自然很多。以最近的说，在纪念他的若干文章中，就不乏充满崇敬之情的赞颂。如一篇文章中称：“先生是同盟会山西最早加入者，辛亥革命太原起义

的领导者，山西政经建设的奠基者，北伐之役北方的先驱者，抗日战争北方的支柱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维护者，世界大同的设计者，中国建设的策划者。”这一串“者”，尽管没有加什么豪华的修饰词，也没有用什么“家”，什么“英雄”之类的尊称，但对阎锡山的评价，可谓尽善尽美，达到了“完人”的高度。

还有文章说：“说到阎伯川先生创造历史……，谨列举其中较具体而重要的四点如下：一、献身革命；二、建设山西。民国初年至北伐成功前，伯川先生以‘保境安民’号召，努力建设山西，以致山西政治修明，人民安居乐业，被誉之为‘模范省’；三、积极抗战；四、撑持危局。”

而对他的公开贬斥，亦是言辞激烈，针针见血。如在阎锡山逝世之后六、七天，针对有些人鼓吹应对其实行“国葬”的提议，台北的《民族晚报》专门发表一篇社论，名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社论说：“阎氏四十多年的政坛生涯，固然有受人赞扬之处，但受人指责的地方，亦颇不少。举其著者，如民国四年附和袁世凯帝制运动；民七年出兵湖南抗拒护法军；民十九年背叛中央，掀起南北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十九年四月五日中央下令通缉等固无论矣，即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综合阎氏一生历史，纵不能罪多于功，至少是功过兼有，瑕瑜互见，哪里符合《国葬法》所规定的‘有特殊勋劳，有伟大贡献？’他的一生又哪一件增进了国家地位、民族光荣？……”中国有所谓“盖棺论定”的传统，对死人往往是多加褒扬，而对其过错则轻描淡写，略词带过。阎锡山刚刚盖棺，蒋介石亲往致祭，并送以“枪怀耆勋”的匾额，还以政府名义颁布《褒扬令》，纪念规格可谓高矣。而在此气氛之下，冒出这样的“社论”，显然不是毫无背景的文人所发的牢骚，而很可能是表现了国民党正统派对阎锡山的真实看法。

还有一封“在台三晋人士于阎在世时的一封公开信”，其言辞更不客气。信中说：“你在山西执政近四十年，做了些什么呢？众所周知，民四你对袁世凯劝进，民六参加督军团祸国，民七出兵湖南抗拒护法军，民十二助曹锟贿选，民十五出兵袭击国民军，民十九背叛中央……你一生投机取巧，反复无常，蔑视党国，只图自身利益，惯于骑墙观望，利用机会，以求达到你的需要与存在……”将阎锡山满面抹黑，说得一无是处，其用词用心，显然也非等闲之辈。

大陆方面，对阎锡山严词贬抑，情有可原，亦是历史常有应有多有的情况。台湾国民党方面，对阎锡山有如此多的不满和贬损，应当说也是有其理由的。上述引文中列举的各项指责，你能说它哪一件不是事实呢？

复杂的历史造就复杂的人物，这当然不完全是阎锡山个人因素造成的结果。

历史造就人物和人物创造历史，也如一枚银币不可分的两面。辛亥革命以来纷纭复杂的民国史造就阎锡山这样的人物，而阎锡山的活动，也给历史增添了一份特别的内容。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在根本上结束了封建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存在。但是，历史的惯性却不那么容易改弦更张。革命后的中国，与其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如说还是陷入了如同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封建割据的局面。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由统一到割据，由割据到统一，几乎是一个循环的模式。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成为有头脑的人们观察时势发展趋向的一个向导。代表统一的中央政府衰败之后，各种力量纷纷拔地而起。既有农民革命起义的洪流，也有藩镇、地方官员反戈和趁机起事的豪绅实力派，还有境外民族入侵势力。各种势力围绕占地、抢权的中心问题，进行昏天黑地的大拼搏。分分合合的混战中，历经“大浪淘沙”般的选择过程，败者被淘汰出局，成为“寇”；胜者得以掌握统一后的政权，是为

“王”。这种反反复复的演义，积淀下厚重的文化观念，趁天下大乱而起事，几乎成为有抱负或野心的人们本能的反应。如诸葛亮的《隆中对》那样精辟预见天下大势的固然不多，但身处乱世，存心窥测王权者却为数不少。辛亥革命后，中国又进入一次“合久必分”的局面。形形色色的实力派，出于各式各样的动机，在这块饱受苦难蹂躏的大地上开始了争斗和厮杀。他们依仗手中的枪杆子，把国家分解得支离破碎；巧立名目，千方百计争夺中央政府大权，“逐鹿中原”，演绎着春秋战国一样的合纵连横的故事。真是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党，保皇党，复辟派，各方军阀，纷纷上场亮相。

当然，毕竟已经进入了20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演义模式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尽管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勇敢地完成了结束封建政治的历史使命，打出了一面崭新的民主共和的旗帜；尽管与广大的农民队伍相比还非常弱小，中国的无产阶级也还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响应席卷世界的共产主义潮流，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率领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同盟军，以“造反有理”的壮举撼动着压在头上的大山。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让这种封建割据增添了殖民性质。在后台表演的各路军阀，除去他们各自的利益驱使之外，相当多的，或者说更多的成分是代表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正是如此复杂的矛盾，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民国史。

在这纷纭的时势中，阎锡山处于什么位置呢？

他有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于满清王朝的腐败，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应当说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到日本留学，接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成为“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参加并领导山西的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始阶段，他属于反封建的革命派。

在山西起义成功之后，他手中有了军队，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把山西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手中，苦心经营这块生他

养他的土地，他成为一个占地割据的地方实力派。

随着实力的增强，羽翼的丰满，他的对外扩展的野心不断膨胀，积极参与到“中原逐鹿”的混战中去，势力范围渐次扩大。西探绥远，东出娘子关，由一省的实力派迅速成为雄踞华北的大军阀。在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中，靠着较稳固的根据地，靠着较强的实力，也靠着常常高人一筹的谋略，他日渐成为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相对抗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原大战中，虽然短暂，却也显赫一时地当上了“国家元首”。

在这个过程中，参加辛亥起义时的那点革命性已经日渐淡化。身为同盟会前辈，国民党元老，却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常与国民党势同水火；自称为孙中山的学生，却屡屡欺骗、背叛孙中山。对当时曾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各种力量，他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常常能左右逢源，在投机中得利。对北洋军阀各派如此，对新军阀的各派力量亦如此，甚至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也如此。最终因对共产党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却没能如愿以偿，从而孤家寡人地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同时也就宣告了他的处世哲学和政治原则的破产。

他的哲学和原则是什么呢？是所谓“在存在中求生存”。

阎锡山心目中的“存在”，就是他自己及其集团的存在，就是他所鼓吹的那套理论的存在，就是他的独立王国的存在。

应当说，在当时的军阀中，阎锡山是个有思想的人物。他有儒家文化的基础，又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还潜心研究过共产主义学说，肯学习，多思考，长于政治设计。终其一生来看，真正成为他的思想核心的，还是儒家思想。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长处，他的吸收利用，不曾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而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反对。他一贯自视甚高，对于历届“中央政府”的政令，从来不当回事。山西的事情，都

由他自己设计,自己操作。成败另论,这种以治国方式治省的做法,是他的一大特征。而正因如此,他把山西视作不容别人插手的自己的领地。“保境安民”也好,“守土抗战”也好,“埋头建设”也好,目标都锁定治下的土地。这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也显现出他讲究实际的一面。

要在混乱的历史环境中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历史环境选择的生存对象,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相当的实力,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在天翻地覆的混乱局势中灵活应变的策略和能力。缺乏前者,有再好的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蓝图也只能化为泡影。孙中山先生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多次遭遇失望和愤怒之后,终于明白了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而这个道理,以拥兵自重、靠军队割据为特征的军阀们,千百年来就天经地义般信奉无疑。至于后者,看似简单,实则非同小可。乱世的特征就是瞬息万变,不善于适应环境利用矛盾,就失却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比喻的说法,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

在适应当时历史环境的“硬件”和“软件”方面,阎锡山可谓二者具备,不仅具备,而且比较杰出。

他所依据的山西,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弱省。这就要求,他必须努力加强这块根据地的建设,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不断扩大军队。这一点,他看到了,并且也做到了;在群雄割据,瞬息万变的时势中,作为比较弱小的一方,必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灵活多变的策略,适应环境,利用机会,利用矛盾,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这一点,他不仅看到了,做到了,而且做得令人眼花缭乱。一个比较弱小的力量,在众多强大势力的空档中生存发展起来了。当人们对他的投机善变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和鄙视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也是他成功的一部分。

代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共产党,一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使得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势演义,发生了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的进程,又使这种变化产生巨大转折。

阎锡山从他的“存在”需要出发,参加抗日,并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八路军在山西建立并日益扩大的根据地,不仅对抗战的胜利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后取得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阎锡山只讲自己的“存在”,而不看历史的大势;精明的算盘被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野心所左右,顽固坚持反共到底,结果就是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阎锡山有过他的辉煌顶点,那就是成为众多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有过他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参加并领导辛亥革命的山西起义,就是在抗战初、中期参加并领导了对日军的浴血奋战;有过他的独特贡献,那就是对山西的开发和建设,使一个偏僻、落后、贫困的小省面貌大变。

阎锡山始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注定了他尽管在历史上有过贡献,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胜利进军面前,不能不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

二 “土皇帝”辨

提到阎锡山,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绰号:土皇帝。似乎“土皇帝阎锡山”或者“阎锡山是土皇帝”已经是一个定论。

不过,认真辨析一下,这个称呼也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

先说“皇帝”。

从参加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担任大都督起,到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下逃出太原止,阎锡山在山西主政近四十年。其间虽然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有过短暂一段时间“下野”,但事实上山西的军政大权仍然由其遥控。这在走马灯一般

上台下台的民国政界，如此长期执政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有人进行过详细统计，称：“民国元年至十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军北平，短短十七年间，北方更迭了十二位元首，三十二届内阁，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而阎督晋，安如磐石，稳如泰山，保全了山西一块净土。阎则在政局屡改、军制迭易、万官朝不保夕、五日京兆声中，职权不变，任期最久，成为不倒翁。”

这首先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大路，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这是地利。其次，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余地。这是天时。有了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当然是人和。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蠹贼，当祸害百姓的蝗虫，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罢，都是其他军阀不谋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不少，这就使他的统治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给他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同时，阎锡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组织构建，在对内笼络和控制人心，对外韬光养晦以利用时机方面有他独到的策略权术。他的算计精明，两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现，虽然从道德的层面，人们可以鄙弃或谴责，但在乱世取胜的军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

从阎锡山自己的意识或者说愿望来看，他也是用治国的方略来治省的。对于袁世凯、黎元洪们的中央政府，他以保全自身为目标而敷衍应付，自然不在话下。就是对国民党

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他也是利我者用之。可以说,他在山西,一直是自行其是,另搞一套。他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地试验和推行自己的设计。行得通行不通,行得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一意孤行地坚持和探求自己的道路。从1920年开始举行“进山会议”起,他就有意识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探寻另外的道路。到后来总结出“中的哲学”,提出所谓“物劳学说”,一直到跑到台湾后关门著书,洋洋百万言研究设计“建设中国”、“世界大同”的空头方案,既是一种执着的努力,也是一种愚顽的无奈。出于这种心理,阎锡山要求他的部下把他作为国家领袖来崇拜、效忠。长期处于山西第二号人物地位的赵戴文就公开承认:自己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应当说,这是在对其他所有部下“以身示范”。而到了抗战时期,在阎锡山出场时,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已经成为森严的制度。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是封建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现。

特殊历史时期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特殊的历史现象。阎锡山把山西搞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本人在山西如此称王称霸,确实称得上是山西的“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称王天下的皇帝,所以谓之“土”。而这个“土”,也显现着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不大合拍,与人们想像或期待中的皇帝模样不大一致,被人们讥讽或鄙视的含义。

一是说他有浓厚的封建性。虽然曾是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派,但并不妨碍其心灵深处仍然是一方封建意识的厚土。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对于皇权或变相皇权的迷恋,对于民主共和和法制的轻藐……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远比掩在脑后的辫子难以去除。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在反孔批孔的路上走得很为坚决,但诸多令人遗憾或愤怒的事实还是证明,封建观念、封建意识的力量远比人们意料中的要凶恶、顽强得多。适宜的土壤生长大树,茂盛的树木也强化土壤。阎锡山虽然在引进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山西经济方面有些堪称明智的动作,但其对封建文化和传

统的依恋却是不可动摇的。他的“思想日记”、“补心录”、讲演稿以及铭刻在府第墙上的“家训”等等,大量引用摘录的都是孔孟语录,发挥之处,虽然不乏思辨哲理的闪光,但基本上是在“仁义礼智信”的范围内转圈子。权力到手之后,他大兴土木在老家修建官邸以光宗耀祖,前后陆续 20 多年,修起大小院落 20 多个,房屋近千间,成为近代官僚中极为显赫的一处大庄园;利用权势,除了在商业、工业、金融等领域为家族攫取暴利之外,还迅速在五台、定襄一带大肆抢收土地,集地不下 20 万亩,成为山西最大的地主。他心目中的人生道路仍然是两千年来传统的封建官僚所走的道路。有一则小故事记述了蒋介石夫妇 1934 年到太原时的情景。故事说:蒋介石夫妇到太原后,阎锡山的二妻徐兰森陪同宋美龄游览,其间到王靖国的公馆休息。王靖国的母亲说:“太太是当今的皇后娘娘,花不完的钱,享不尽的福,说起来甚也好,可就短生个娃娃。”徐兰森赶忙说:“没娃娃也不要紧。定襄七岩山上有个捞儿洞,可灵哩。花上三元钱,在水里捞一捞,三元开泰,回来准捞上个娃娃。你人忙顾不上去,也能代替,我替你捞一个去。”此话将宋美龄逗得前俯后仰,大笑不止。——从宋美龄的笑声中,人们会感到阎锡山这个二夫人的可怜;但再一细想,不是也更看出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巨大差距吗?蒋在个人感情之外,还有着眼外面世界的目光。而阎锡山却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原因,遵从父命,买来一个时仅 14 岁的女孩儿为妻。观念上的这种巨大差距,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相应的差距,或许,这也是阎终究斗不过蒋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的第二个表现,是阎锡山处世行事都比较保守。因为势力弱小的原因,也因为身处比较闭塞的偏僻山区的原因,也许还因为他精于计算、不肯做赔本买卖的原因,阎锡山一贯小心谨慎,凡事以保本为原则。冒险的事情不干,失大于利的事情不干,遭遇挫折,极易退缩,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中原大战前后的此种表现可谓登峰造极。他还有极浓厚的地方观念,在全国以本省划

线,在全省以五台划线,搞狭隘的地方山头。“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句民谣对他的用人路线可谓一针见血。在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时,建立牺盟会,所用的共产党人也要是山西籍的。随后又成立的决死纵队,他在同意采用共产党军队的政委制的同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坚持政委必须是山西人。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学友孙传芳曾嘲笑他这种土里土气的保守观念,给他取绰号为“厨子将军”,讥笑他像厨子一样,终日周旋于菜板和锅碗之间,不肯不敢迈进一步;另一个学友李烈钧也认为他只配在山西老家出头称雄,实在是如同井蛙观天。

“土”的第三个表现,是阎锡山精于算计而表现出的“抠门儿”。这一半是因为,山西经济落后,财政紧张,不得不精打细算;另一半则是出于阎锡山本人的商人习性。他对于算盘情有独钟,常说“算盘珠子下有金”。从大连返回山西在河边村家居时,到川至中学看学生上课,就给学生们出题:以本钱银元一元,年息二分四厘(当时乡村的一般利率)复利计算,一百年之本利之和为多少?算下来居然有23亿之巨。阎锡山于是告诉学生们:你们这就知道算盘珠子的厉害了吧?当然,这一计算所显示的并非算盘珠子的力量,而是盘剥敛财的本领。它折射出阎锡山内心深处的世界。以精明的计算来比方政治,同样能说明这一点。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是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的。为了说明自己正确,他以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太原开古董店的老板,都是善言巧语极富生意经的。比如一个康熙瓷瓶值六元大洋,他开口就要九元。顾主还他八元,他连声说,瓶子是八元五买进来的,由于你的诚意,我可照本钱卖给你,可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赔钱呀。顾主听讲得有理,被感动了,就用八元五买下了。可这一来,正上了古董商的大当。现在与共产党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买古董一样。”如此匪夷所思的比喻,却正是阎锡山念念不忘的思路。这种精明算计的“抠”劲儿,曾经在紧要关头,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原大战时,他派往东北游说张学良的代表,就因手头拮据,无法买通关

节,连张学良的面都难以见上。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则出手阔绰,活动自如,对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拥蒋反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抠”劲儿,又在重大事项中,显示为一种刻意的节俭。建设山西同蒲铁路的过程中,也正是靠着项项工程都精打细算的精神,以有限的财力办了更多的事情。以当时最低的成本,修成了一条给山西带来巨大效益的铁路。

这样看来,用以讥讽的“土皇帝”的称呼,其实是相当确切的民间评价。

三 虚幻于“道”而精明于“术”

阎锡山在晚年答客问时,将自己一生的经历概括为五个奋斗。他说:“我的奋斗有五:一是对满清皇朝的奋斗;二是对北洋军阀的奋斗;三是对自然的奋斗;四是对日本侵略的奋斗;五是对共产党的奋斗。”应当说,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括,从现象上看,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他没有说清楚,大概也说不清楚,自己一生究竟是在为什么目标而奋斗。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共产党手中,三民主义的旗帜在蒋介石手中。阎锡山标榜自己既不同于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独立特行,煞费心地提了不少口号,但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义,而且只能限于空洞的设计。有人将他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主张概括为:“基本原则:‘资由公给’,‘田由公授’,以消除资本剥削、劳资对立的经济恐慌;‘按劳分配’,以劳定享有,以享有励劳动,做到‘劳享合一’;以物本位的物产证券,改革金银代值的货币,以增进生产;实施共财富不共生活,共救济不共养育。推行要领:土地公有,耕者有地种;发展民营企业;企业资本全民所有,企业成果全民共享;采用现代化管理方式经营,提高效率。”不难看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主义学说,却又剽窃了若干口号;他不得不承认资本剥削、劳资对立的阶级斗争,却又力图维护当时“穷者更穷,富者愈富”的现行制度。末了,只能